

吾宅双门
韩素音著
陈德彰 林克美译



韩素音 著
陈德彰 林克美 译

吾宅双门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海外炎黄精英丛书

韩素音自传

——吾宅双门

韩素音 著
陈德彰 译
林克美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 / (英) 韩素音著；陈德彰，林志美译. -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 (1994.12 重印)
ISBN 7-80074-527-9

I. 韩… II. ①韩… ②陈… ③林… III. 韩素音-自传
IV. 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5462 号

海外炎黄精英丛书
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
韩素音 著
陈德彰 林克美 译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30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国家建材局情报所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 342 千字 16 印张

版次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1994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074-527-9/I·239

定价 12.60 元

序

韩素青 Han Suqing

西哲有言，人而无知一己民族的历史，终将在劫难逃。民族文化的倖存有赖于民族自觉及热爱这一文化的过去，有赖于有意识的确认其不断做出的努力与成就。这些努力与成就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蕴育了文化。

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至今还如此强劲有力，能够适应及生存于历史长河中的迭次变革，因为它能坚守历史的延续性。虽然这种对于过去时代的依恋，有时遭到批评和指责，因为它对新形势的适应过于迟缓。可是从时间递嬗的眼光看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中国较其他国家（除了日本），其变化是远为迅速的。

整个人类既是历史重大事件的产物，又造就了我们社会行动和我们的意识。作为一个欧亚人，介乎两种文化之间，我在数十年生活中比多数人更深感其互相的汇合与促进。这两种文化，对我个人性格的形成显示了巨大的历史性力量。

因此，我写这些书，不但是部自传，仅仅记录我个人的生活以及形成我性格的具体环境，而更为重要的是关连到当时的中国以

及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这是一个初次尝试，我想通过个人或许多“个人”，使历史知识易于被人接受；也许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个人，我在历史发展和受其左右的人们之间，发挥了它的一线牵连作用。

所以，这样的书写来并不容易。我的目的是要使读者注意到我们这些人，浮沉在历史的宏伟长河之中，巨浪时起时伏，我们既是它的组成部分，又是主体和活跃于其间的主要力量。

我的这些书，在某些西方大学里今天被作为值得研究的历史著作。但他们又可作为消闲的读物。这些书里并不尽是死者、枯骨，或是指导过生活的事迹与岁月的积聚，而是我们亲身经历过和意识到的一部分，构成我们的灵魂与决心。

“只有知道我们的过去，才可能使我们支配与塑造我们的未来。”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被孤立起来或者自我孤立于大地上其他国家及民族之外。我的这些书，我想是可以供给年轻人若干知识性和趣味性的读物，因为这些青年正在探索对于他们各自生活的意义。

(冯亦代 译)

第一章

香 港

(1948. 12. —— 1950. 9.)

那是一个灰蒙蒙的令人不安的月份，尽管朋友们都很担心地一致劝阻我，预言会有灾难，我还是抛弃了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在英国的事业。1948年圣诞节，我和蓉梅动身去香港。朋友们的劝告仍然在我耳际回响：“简直是疯了，把孩子送到战乱中去”；“至少应把蓉梅留在英国”；“那儿在闹革命，香港随时可能被攻陷。”尽管表面上我显得轻率，我心里确信回去是对的。在最后告别之前我不在乎显得犹豫不决。

我无法解释，即使我不能住在革命将建立的新中国，我还是听到了再生的凤凰美丽的翅膀在空中飞翔的声音。我在英国也呆不住了，因为继续呆在英国将是对中国的背弃。新中国也许会处死我，可是我还是要回去，至少站在大门口，既不顾一切，又小心谨

慎，我能活下去。在香港我可以呼吸到从中国来的尘土，闻到从中国来的气息；要是不走，我会枯萎，成为一个毫无生气的活着的木乃伊。这倒不是因为我在英国不快活——我很快活——而是因为失去了快活或不快活的机能——我只是在麻木表象中挣扎。在这儿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成了重大的要事，所有的激情都被吞噬，只剩下昏昏沉沉的虚幻。我向往再生凤凰栖息歌唱的那片茫茫森林，在那儿我可以听到她的翅膀在空中扇动的声音。

我不想让大肆宣扬即将发生而又未发生的那些莫须有的事搅得我睡不着，也不想苟安中消磨时光。1948年11月一个阴沉沉的下午，我去拜访戈登·金教授。金教授是香港大学妇产科系主任，这次短期来伦敦。他曾答应过要见我。

同戈登·金的会见是我的朋友弗朗西斯·潘和塞西莉亚·潘安排的。我是在重庆认识他们的*，1948年11月在我关键的时刻他们来到了伦敦。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正在一步步占领满洲**。蒋介石一边扬言“胜利在望”，一边将价值4亿美元的黄金运往台湾。弗朗西斯·潘在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工作，来伦敦也许是为了再次募集资金，可是我没有问，他也没有告诉我。我上次见到他是在1942年1月。我的第一个中国丈夫保黄被擢升为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武官，我抱着裹在大毛毯里的蓉梅乘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去加尔各答，然后经过好望角、特立尼达和纽约去英国。自那以后，我一直没有见过他们***。

潘氏夫妇对我的友谊始终如一。1948年10月他们一到伦敦

* 见《寂夏》。潘的中文名字叫潘光炯。

** 指我国东北。——译者

*** 见《寂夏》。

就打听我的下落；可是中国大使馆不知道我的行踪，我和大使馆，和许多一度曾经是我朋友的外交界人士断绝了一切来往。“我寻思了半天，”塞西莉亚说，一边用一只可爱的手摸着额头摆出思索的样子，“后来我想起来，‘伊莎贝尔·克里普斯肯定知道她的下落。’”

她没有问我为什么突然销声匿迹；她猜想我要和那一段生活一刀两断，和1945年3月以前的故我一刀两断。1945年3月保黄乘火车离开伦敦回中国去，挥动手杖同我告别，身不由己地含愤死在战场。他是被自己的士兵打死的，最后终于认识到自己把一生交给了他最终蔑视的独裁者蒋介石。那个寒冷的早晨，我冻得直打寒颤，赶回皇家自由医院去参加入学考试，开始了一个学医的学生的新生活，不再是外交界的一员。

“目前情况还不太明朗”，弗朗西斯随和地说道。蒋介石的高级官员们正在把财产和家眷转移到香港去，潘家也在那儿租了一间房子，“以备万一事情不可收拾”。那以后的三十年，潘氏夫妇一直住在香港。塞西莉亚教钢琴，弗朗西斯则在香港大学任教，有一阵子还搞过股票买卖。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始终是原来的样子，直至变得虚幻缥缈。对我这样的人，甚至在感情和想法上已和他们迥然不同了，他们的忠诚和友谊却始终不渝。他们始终彬彬有礼，我轻率的探索也罢，我最终对于中国及其人民的过去和将来都充满信任和希望的发现也罢，他们从来也没有责备过。

“我们必须等扬起的尘土降落下来，”塞西莉亚说，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啜着茶；他们住的旅馆十分豪华，窗上挂着紫色天鹅绒帘子。可是我们宁可在香港，而不是在伦敦等尘土降落下来。听说我要回去，塞西莉亚立即行动起来。“我给戈登·金打个电话；

他正在这儿探亲，他能替你在香港找到工作。”

我还记得戈登·金两道浓眉下令人难忘的蓝眼睛，以及因为牙镶得不好而显得有点不自然的笑容。那个年代澳大利亚人都喜欢戴假牙，戈登·金正是澳大利亚人。他完全理解我想要离中国近一点的心情。“那么多中国人和你的心情一样……他们离不开中国，但是又担心共产主义，不知道共产主义会对他们怎么样……”我谈起了蓉梅：“她是中国人，她应该对自己国家有感情。”“我们会设法替你在香港找到工作的，”戈登·金说，下巴往里一收对我一笑，表示鼓励。

那些日子里连飞机都是磨磨蹭蹭的，天一黑就停下来。吃晚饭，溜达一阵，回旅馆睡觉，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飞机才起飞。我们在开罗、卡拉奇、加尔各答的三个晚上都过得不错，然后在曼谷下了飞机。我要在那儿停留一个星期，和约翰·科斯特乘下一班去香港的飞机。“你不能错过泰国，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文明之国”，约翰写道，“别急着往东赶往烈火蔓延的地狱去作祭品，不妨先停下来看看这么一个迷人的国家。”

那时的曼谷不像今日这样，到处是令人讨厌的钢筋混凝土大楼，拥挤的街道吵吵嚷嚷，挤得水泄不通的汽车排放的废气令人窒息。那时的曼谷，一片翠绿中散布着一簇簇有凉台的平房。每隔开一段就有一座雕梁画栋的庙宇，庙角的小铃铛在微风中叮当作响。沿路婀娜多姿的香蕉树和棕榈树指明一个个入口。一排排亮红的美人蕉勾勒出一条条安静的泥路，牛车在路上辘辘而过，偶尔驶过一辆汽车。泥土大道两旁茂密的树林在天地之间张开巨大的手臂。我永远也不会原谅砍掉这些树的泰国人。

芒果树和金香木树装饰着约翰的典型的暹罗别墅。那幢房子

确实迷人，只是我没有时间去欣赏和留连。可是太阳和温暖产生了奇迹，三天之内我就恢复了敏锐的感觉，眼睛和鼻子都能愉快地感受这一切了。约翰和其他几个白人男子穿着灰色的泡泡纱衣服，自由自在地到处走，在金色的安静的步态优雅的暹罗人中间，像水面上漂浮着的油珠。这儿表面上看上去没有什么磨擦和敌意——约翰和他的朋友们都这样评论说：“这儿和别的国家完全不同，在别的国家，人们现在朝白人吐唾沫！”在这儿，他们几乎可以声称自己已部分地溶合在他们所称的“亚洲之魂”中。这是一个夸张的、征服者的说法。我去看庙宇，逛花市，去领略纵横交错的水道。约翰给我讲述东南亚的情况。他辞去了外交部的职务，专心致志于印度尼西亚的独立。1948年11和12月间，荷兰人开始了一个军事行动，要重新占领印度尼西亚。在一些西方政客看来，用武力在亚洲恢复殖民统治仍是可能的。然而为时已经太晚了，约翰知道这一点。他在用飞机将金锭运出来，替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苏加诺购买枪枝，来往于马尼拉、新加坡、雅加达和曼谷之间。

1月5日傍晚，我和蓉梅通过飞机的舷舱看到了我们在香港有点危险的着陆点。不大的机场坐落在悬崖峭壁之间一条狭窄的峡谷中。飞机先盘旋了一个圈子，然后直插下去着陆。香港是金岛蓝水，天空像一块乳白石罩在九龙山上。“啊，真美，美极了！”我叫道。“只有冬天才美，”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个英国商人说。“夏天可不好受。”接着他解释说，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那座山峰都笼罩在雾中，农历新年就更糟，因为人们大放烟火爆竹。“男女佣人都离去。”他还告诉我必须尽快到政府大厦去登记。

我们走下舷梯，踏上了香港。蓉梅有点发愣，紧紧拉着她的小手提箱。我对她说：“你到家了，蓉梅，几乎就到家了。看看，这儿所

有的人都像你。”

弗朗西斯·潘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我们送到教会招待所。塞西莉亚在那儿预订了(更确切地说要求给我们留了)“住的地方”，因为香港挤满了从中国撤出来的传教士和商人。教会招待所是一座灰色小楼，在香港岛的半山坡上，就坐落在兵头花园之下。公园里巨大的羊齿类植物像一顶顶奇怪的伞，将其种子轻轻地洒在游人身上。现在教会招待所已经不见了。在今日香港一大排一大排恐龙似的摩天大楼中，在挤满了像捕食的猫发疯般飞驰的汽车既没有树木也没有花园的峡谷似的街道中，我未能找到那房子。

1949年香港就开始变得像纽约曼哈顿那样，没有一个城市像这样猛拆猛建，而且这三十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香港永远是推土机和大吊车，楼房越造越高。现在地皮很宝贵，因为几片花岗岩山脊上都已盖满了房子，必须腾出地方来盖更高的楼房。海湾也被填没用作盖房子的地方，香港日益扩展的建筑蔓延到了大海本身。

第一个星期我们和一个老在打毛衣的英国女传教士合住一个房间，她讲到中国时语气平淡。“没有办法，亲爱的，那儿的人太可怜了”，她低声说，手里两根毛衣针不停地一戳一碰。后来我们搬到地下室和钟阿达、她的两个孩子和狼狗苏西合住一个房间。阿达是广东人，是个寡妇，基督徒。她精力旺盛，小心谨慎，工作勤恳，品行端正。苏西占的地方比我们五个人的地方还大，我们五个人和行李都安顿在它四周；它使我们成了一个有礼貌的集体。

香港令人神怡。深邃的蓝天；欢乐的大海水晶一般能照见人，乘轮渡去九龙来回时，听得见船下水声汨汨，感觉到从脸上拂过微微凉风。我们到九龙那一侧的金马伦道去，潘家的房子在那条路

上。我在维多利亚岛*顺着水管道沿坡拾级而上。一幢幢优雅的老式别墅周围石墙顶上,花盆里的一品红伸出朵朵绽开的洋红色的花。阶梯式的街顺山坡缓缓而上。沿街数不清的小店铺日夜营业,还有那些吃的,那么多好吃的东西。每样东西都是人间最美好的享受。我和蓉梅在短短的休息期间几乎都长胖了。我找到了冯平山图书馆,办了一张借书证,开始贪婪地读起鲁迅**的著作来。我发现了维多利亚峰,它不仅是地理上的一个海岬,从那儿饱览海湾宏伟的景色,也是香港阶梯式等级制的一个象征。那些商业王子们——怡和洋行的职员,还有其他的人都住在那儿高耸的大厦里面。这些大班***中大多数都是苏格兰人,每年在特定的日子吃苏格兰布丁是香港最隆重的宴席。从社交来说,接到怡和洋行的邀请,胜过在政府大厦受到招待。

政府大厦位于半山腰。大厦有一排协调的白石柱,从维多利亚峰上看去像一块雅致的婚礼蛋糕。我在来宾簿上登记了我的名字,很快收到了去午餐的邀请。

亚历山大·格兰瑟姆****(在香港特殊用语中称为“督宪”)个子很高。他的美国夫人长得很矮小,耳朵虽背,但风韵迷人,两鬓总是梳着一对卷发。我钦慕她总是那么洁白无暇的皮肤。“我真希望你喜欢这个地方,”亚历山大·格兰瑟姆说。不晓得什么缘故,我和格兰瑟姆夫妇一见如故。从那以后,我常常被邀请去政府大厦——

* 维多利亚岛,即香港,早先许多英国人用这个称呼。——译者

** 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近十年来对于他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颇有不同说法,毛的夫人(江青)一伙在篡权中利用了这一点。见《早晨的洪流》和《风满楼》。

*** 大班是人们对19世纪东印度公司商人的称号。

**** 亚历山大·格兰瑟姆,人们叫他葛量洪爵士,1945—1957年任香港总督。——译者

至少一年四次。后来，赛马时还被邀请到“督宪”的包厢去。

亚历山大·格兰瑟姆有一种卓越的才华一直小心地没有外露过。他懂得历史，能从骨髓里感受到历史。他和我一样，懂得他生活着的这个时代，看出了这个时代的变化。我总觉得他对我的喜欢部分地是一种超感觉的，默默地认可。我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担当着开路人，在新旧之间架设桥梁。在他看来，有朝一日，香港这个英国殖民主义、中国劳动力和需要的产物会在新的事物格局中起一个特殊的作用。他的预见很对。

殖民主义的危害在于，它在接受了殖民统治秩序的人中间造成了一种甘心情愿却不健全的创造激情。这种失去了民族身分的感情不仅在许多华人“上层阶级”中蔓延，也影响了英国人。为了没有外来人的感觉，他们千方百计地保持家乡的风俗习惯，把他们对艺术古怪的惰性归之于天气。英国早就束之高阁的那些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种种繁琐区别在这儿得以恢复，以赎回等级制度使之重新有了价值。人们为了保持过时的仪式中的种种繁文缛节花了多大的精力呀！香港社会流行着几乎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假正经，谁打搅这种做法会遭到猛烈持久的敌意！

50年代，如果一个英国人（或许我该说苏格兰人）娶一个中国姑娘，在商业界肯定会被看不起，马上会导致被降职。（讲英语的）香港大学的学生们被培养成俯首贴耳、不会思考的人，避免在言辞上或行为上触犯上司。他们成为医生和律师，完全顺应他们的财富（大部分人出身于有钱人家庭）在社会的阶梯中所占的位置，而有钱则可以赚更多的钱。

可就在1949年，所有这一切都已开始改变，这一变化是由于中国国内的变化造成的；尽管这一变化，开始在香港没有受到人们

的注意。今日香港不再是种族、肤色和报酬样样都有细微差别的香港。现在一个年轻有为的英国人会华语，娶一个中国姑娘（当然要出之豪门），都成了一种财富。香港大学已用英语和华语两种语言；其教授们（许多是华人）带学生去中国旅行，回来后则连篇发表关于中国的热烈的讲话。这些讲话都会及时地在这个殖民地众多的“共产主义的”和非共产主义的报纸上得到报道。今日香港有众多的画家、音乐家、雕塑家、甚至作家。他们中有许多是华人，他们都使用华语，以迎合日益增长的公众的赏识。他们也受到住在香港的西方人的赞赏。香港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得很友好。人们谣传说香港实际上有两个“督宪”，一个是英国总督（当然应是苏格兰人），仍在政府大厦中行使职权；另一个是隐蔽的、鲜为人知的中国总督，他不时地作出一些暗示，以便现在也好，将来时机成熟香港要回归中国也好——这件事已不再使人感到沮丧——香港的繁荣实力不会受到丝毫的干扰。

2月，我开始在玛丽白医院戈登·金的妇产科系当助理医生。戈登手下的住院外科医生是一位叫索菲·巴德的很不错的姑娘。她是来自上海的白俄，于4月份要离职结婚，到时候由我接她的位置。在她离开之前，我每天去玛丽白医院，索菲休息的日子我就用她的房间。使我感到心悸的是我一开始就闯了一个祸：下班忘了关窗，把她的台灯打碎了。我忘了突然从海上吹来的阵风刮得进医院的房间。

我的月薪大约为700港元。一个人用绰绰有余，可是要养活蓉梅，替她买衣服，供她上学，就有点拮据了。我每星期有六天要去医院值班，蓉梅上哪儿去呢？塞西莉亚又一次帮了我的大忙：她让蓉梅住在她家，和她的女儿雪莉住一个房间。可是后来潘家的亲戚朋

友不断从中国来找他们，他们也越来越不方便。解放军于1949年4月开始发动大反攻，通过一个个惊人的战役，一个夏天很快攻下了南京、武汉和上海。蓉梅只好去圣·斯蒂芬学校寄宿。负担她用去了我一半以上的薪水，可是我还是设法维持下来了。我训练自己只在晚上吃一顿饱饭，中午只吃5分钱的花生米。

起初一切顺利。我努力工作，尽管这儿也是等级森严，我仍然满腔热情。教授们是英国人，学生是华人。高级护士和护士长是英国人，勤杂人员则是华人。我和其他的勤杂工没有什么话要说。他们是典型的香港人，他们看报只看上面的连环画，而且只有星期天才看报。他们非常希望这样“过下去”。对他们不能提在中国发生的事，他们怕“赤色分子”胜过怕他们的主人英国人。可是，时间也慢慢改变了他们的碌碌无为。从那时起，许多人的看法有所改变；尽管在1949年我订阅亲共的《大公报》这件事受到许多同事非难。不过，从中国来的难民和出生在香港的人不一样。我的朋友是像潘家那样“中国的华人”。塞西莉亚常说：“出生在香港的人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思想方法和我们不一样。”

这一情况也有变化，即使在那时，我最终和医院的服务人员，和阿达·钟，和特里萨·郭等真正的香港妇女都成了好朋友。香港人对于来自上海或比上海更远——即华北——的人把他们挤到一边又愤慨又害怕。他们受到的殖民教育加强了他们对竞争对手的恐惧。已经有几个来自“比上海更远”的优秀医生被医院雇用了。英国殖民主义机构中没有足够的英国职员，特别是在较低层，而且雇用亚洲人也便宜得多。6个月之内香港大学就开始招收来自中国的学生。两年之内，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会通过考试，和香港医生们竞争官方的职务。3年之内会建立起一所中文大学。金钱和难民一

起涌进香港，使香港从一个沉睡的港口变成一个富有的大都市。

我很忙。要进行手术，要查病房，还要到香港闹区的西营盘医院诊治门诊病人。可是一连几个星期的没完没了的子宫阴道、阴道子宫使我明白了这不是我的事业。没完没了的子宫切除术，间或有几例卵巢切除术，并没有鼓起我的热情。事实上，我不再想把手伸到盆腔中去，尽管在产科部分，婴儿来到世界上的哭声永远使我激动。可是，除了那些头等病房的单住病人外，医院里的生产很少是“正常”的。我开始认识到，只有特殊的人才会喜爱这个专业；而戈登·金就是一个这样特殊的人。我的才能在于诊断，在于嗅出疾病来。我能透过皮肤和肌肉洞察到病人体内。我现在仍保持着这种直觉的本事。可是我的手并不灵巧，做手术很慢，用起针来也有点不顺手。我能听见别人听不到的微弱的心脏杂音，能通过叩击听出别人会忽略的胸腔里的病变；可是我却不会麻利地缝好普通的阑尾切口，时间并没有能改进我的笨手笨脚，尽管戈登非常耐心。过了一些时候，另一个不喜欢我的助理医生会示范给我看。她会透过口罩轻轻地说：“镊子……切开……结扎……”她总是抢在我的动作之前，而且总是对的。有谁能阻止这位胜我一筹的女士呢？她想要我的工作，最终果然得到了。

当然，我也有一些小小的胜利：我发现因为子宫出血被认为是长了纤维瘤送进来动手术的一个病人实际上得了白血病；发现连白人会诊医生都认为是得了卵巢囊肿的病人只不过是有了身孕。可是那位病人却已寡居了7年。我的同事们，乃至我的上司都深信儒家思想，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中国寡妇竟然会怀孕……

可是在外科和妇科，需要一位切开和缝合的天才，而我并不具备这种才能。戈登热爱他的专业，培养出了像小巧的达夫妮·张那

样出色的妇科医生。达夫妮的手简直令人惊叹，小巧能干，动作敏捷。她很高兴整天动手术，她那么热情。又有一个腹腔需要切开时，她脸上总是容光焕发，我对她既羡慕又嫉妒……

可是我变得不安现状的主要原因是我堕入了情网，堕入了一股香港台风般炽热的剧热的旋涡。它卷走了我的一切决心，使我不能自拔，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

到了4月，香港令人眼花缭乱的冬天变成了春天。斯坦利·史密斯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说我在重庆见过他，可是我却记不起来是在什么地方怎么见到他的了。他却在三叔的一幢房子里住过。我在谷罗士打饭店喝茶时见到了他，他邀请我和蓉梅到他在深水湾漂亮的房子去。我不上班的日子可以和蓉梅在那儿游泳，这对孩子大有好处。

斯坦利是澳大利亚人，在马来亚办铁矿发了财。他身材高大，肌肉发达，前额饱满，薄薄的嘴唇。他天生会赚钱，他那宽敞的房子里有许多价值连城的宝贝。他起居室里许多古玩中有一幅中国画特别引人注目，画上画的是一个衣衫褴褛、邋邋透顶的乞丐，脸上露出一股傲视万物的神情，伸出一只半张开的手。这幅画看上去像是强行挤进房子里来的，使我浑身不舒服。我讨厌那张画，可是斯坦利却得意洋洋地讲述他是如何在共产党军队横扫一切再也弄不到这样的便宜货之前的“美好的往日”，从一位上海画家那儿弄到手的。我觉得画中的乞丐说明了他内心某种朦胧的渴望。斯坦利看这幅画的时候好像在说：“啊，要不是我的机智和旺盛的精力，也就没有我了。”他的太太梅是中国人，圆圆的脸蛋很漂亮。我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刻，一起在斯坦利的沙滩上晒太阳，蓉梅尽情地游泳，到处跑，尽情地吃。这对她的健康，对我自己的健康大有